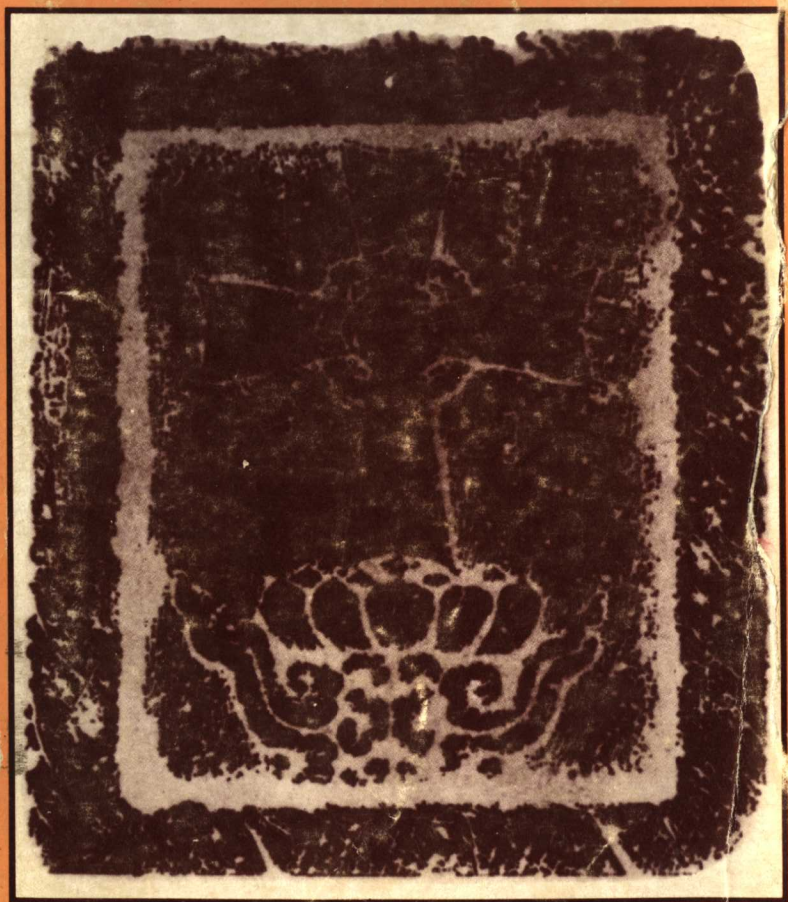


近代中國與 基督教論文集

林治平主編



近代中國與基督教論文集

序

王爾敏

十九世紀基督教輸入中國，爲西方文化東漸之啓機，本爲宗教傳播以至文化交流之良正行動。適其同時，正當西方帝國主義者向洲擴張。種種侵略陰謀，強取豪奪，在中國境內肆無忌憚。中國上下承受西方之災患浩劫，遠大過於西洋教士之博濟仁愛。抑且同是來自西方國家，實難辨別何人是善良可信，何人是險詐可畏。不免一概先存疑慮，懷退避拒斥之心。此實情勢使然，爲必有之結果。

尤有進者，中國各地發生鬧教反教事件，十九必遭列強干涉，形成複雜之外交事件，甚至以砲艦脅迫。列強外交人員，因便乘勢，立功逞能，又不免借此機會，榨取外交權利。煌煌七輯「教務教案檔」，每輯皆有三四冊巨帙，俱爲反教事件發展成外交巨案之實錄，中外有心人士，儘可取以參證研考。

近代西方對中國之強權外交，始於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英國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在上海以砲艦威脅中國漕船。其時五口開埠尙不足四年。阿氏以兵威而迅速解決所謂「青浦教案」，眞使這些德行隆盛之西洋教士永遠蒙羞（註）。事實上，野心與陰險之擴張動機，使西方政治首領始終不忘利用任何教案作爲其強權外交藉口。最顯著是一八九七年德國利用山東盜匪殺死兩位教士而進佔膠州灣，嗣卽利用外交運用，取得山東特殊權利，眞是可鄙的侵略行徑，對於傳教事業的嚴重污染。

由於西方帝國主義者，野心外交家之恃強蔑理，不擇手段，終

使同樣來自西方之傳教士們遭受不少誤解、猜疑、拒斥與仇恨。使其傳教工作，倍增困難。實際上這些滿懷救人濟世之教士，在中國人民無從分別良莠之情況下，多是蒙受帝國主義之名而被害。特別是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反洋殺教，無辜犧牲者均為善良教士，但彼等實際不願也不能代替帝國主義者贖罪。

西洋教士在西方帝國主義者加速對華侵略危害之歷史背景下來中國傳教，真是一路荊棘而且不合時宜。雖然如此，終於仍能播下種子，收穫果實。也足以顯示教士們之努力與貢獻。同時，由於傳教事業在西方勢力之東侵之複雜背景下進行，除了遭遇種種困難之外，而使教士們在華之活動與適應也是變得多彩多姿。

在反一方面來看中國人對於西教反應，實在有許多種程度表現，也是複雜萬端，極難作概括形容。無論信仰或反抗，均無法以單純一方面論點作判斷解釋。必須先作詳慎思辨與深入研究，方可澄清一些問題關鍵。近代學者於反教問題已多有發掘，而興味盎然，迄未終止。一般了解，在個人心理上言，無論是感情或理性基礎，在信教與反教兩方面均有存在。更其複雜部份，是在於社會風俗習尚之衝突。也不免自然進入文化教養層面。總體可見者，基督教之傳播，必然激起社會風俗轉變，文化變遷，因是尤其值得探討研究。

在此有一現象必須明白指出，無論其性質內容如何，近代中國反教強烈，隨時釀成交涉巨案，自然是事實。但一切複雜因素暫不計慮，有一個顯著事實不可否認，就是基督教在中國之發展迅速，信徒日漸衆多，在民間產生信仰與社會行為之重大分化，由此種種接觸磨擦而形成種種反教教案。換言之，反教之強烈，是在基督教發展壯大之條件下形成，此一意義應不可忽視。

當代學者研究中國反教問題，反覆探討，論著甚豐，成就最大。我輩參閱，可以獲得足夠認識，並能了解其複雜內容與委婉情節。中國近代反教，固有感情之激動，亦有理性之思辨。基本上無特殊於中古時代之反佛教，乃至長期佛道之爭。事實上近代反教，尤較佛道之爭更為複雜。一則背景上，政治外交問題加深教案之繁複歷程與分歧宗旨。一則思想上，不獨是中國固有觀念習慣構成重要衝突因素。最顯著者，二十世紀之反教思想，全然依據來自西方之學說理論為其內容，這時已不再以孔孟傳統反教，而重要武器則為純西方之達爾文進化論，泛科學主義，虛無主義以及共產主義，是純粹西化而後之反基督教。

專談反教，只見衝突，亦並非近代基督教輸華史之全部。基督教除宗教活動，尚有更多有意義之影響，在中國而言，實是一種收益，最顯著救災濟貧等等施捨，特別是光緒初年山西、河南大旱災，在華西洋教士，無不全力以赴，捐款施藥，拯救災民，然此尚非重要影響，西洋教士來華傳教，對中國最大貢獻，實在於知識之傳播，思想之啓發，兩者表現於興辦教育與譯印書籍發行報刊，自十九世紀以來，凡承西洋教士之直接薰陶與文字啓示之中國官紳，多能感悟領會而醞釀醒覺思想。同時舉凡世界地理，萬國史志，科學發明，工藝技術，亦多因西洋教士介紹而在中國推廣。

由於近代史研究之新興與其問題之無限擴展，當世中外學者對於基督教以及西洋教士在近代中國之影響也日見注意，近三十年來更有不少精闢之專論論文問世，專門名家輩出，所涉論分析範圍，首以反教問題研究成果最豐，其次亦多留心基督教教會及教士在華之影響與貢獻，同時並有傳記性之介紹，教會書刊圖片之翻印等等，已是洋洋大觀，頗具規模。

4 近代中國與基督教論文集

林治平教授多年致力於近代基督教輸華歷史之研究，除其個人之專著：「基督教與中國近代化論集」早已爲世周知者外，而歷年又屢編學界之研究以及資料圖片等專集三四種之多，使有心探討基督教史志者可以獲得參考方便。今秋林教授又裒輯同類論文十四篇，合刊而成「近代中國與基督教論文集」一種，提供讀者自各個角度以認識近代史上一個具有特殊意義與趣味之研究天地，執筆諸家，立論均具學術嚴肅立場，爲史學上之貢獻，同時亦足代表此一時代基督教史志研究之一部分成果，或者更可啓發學者興趣，繼起而從事更深入而全面之研究，不惟充實近代史學一個重大部門之內容，同時也可以澄清近代基督教輸華問題之種種爭議，相信必爲林教授所熱心期待。

中華民國七十年中秋節寫於香港中文大學

註：所謂「青浦教案」，乃爲一般常識之誤稱，其實毆打教士之水手們並非爲反教而起，拙文「五口通商初期上海地區暴亂事件所反映秘密會社之生機及適存環境」已作說明，載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十二期，一九八一年。

編者導言

林治平

一、編輯緣起

四年以前的九月（一九七七年），適逢基督教第一位傳教士馬理遜博士（Dr. Robert Morrison）入華一百七十年紀念，編者特編選「基督教入華一百七十年紀念集」一書，出版以後，頗能引起學界及有心人士的重視，至一九八〇年三月經已三版出書。在此四年期間，編者復與查時傑先生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共同出版「基督教與中國歷史圖片論文集」，最近一年來，編者在中原大學及世界華人福音會議中華民國區委會的委託下，進行一五年的研究計劃，期對華人難以接受基督教的原因及其解決辦法加以研究，因此，一方面在台灣進行問卷調查工作，以確定中國人對基督教產生反感，拒絕接受的原因何在；一方面收集已有之學術論文詳加研讀，並對研究教務教案之專家學者加強聯繫、當面請益。今年一月，編者應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之邀赴港六週，就基督教與中國一專題與該院師生及有關人士舉行了六十小時的研討演講，並與香港有關學者專家多所討論。至今年七月，編者赴新加坡應世界華人福音會議之邀，提出「華人傳統文化與福音工作」專題報告，並主持研討會，得有機會與來自世界各地，一千餘位中國教會領袖交換意見。然而不幸的是這一研究領域迄今仍甚荒涼，論文資文，零碎分散，收集不易。編者在進行上述研究之時，教會內外各界人士，均以資料分散，收集不易為嘆，並紛以收集有關論文，彙集出書一事相責。編者以茲事體大，惶恐猶豫，遲遲不敢貿然進行。至今年初，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呂實強教授之鼓勵支持，並得曾任或現任該所研究員之王爾敏教授、李恩涵教授王樹槐教授首肯提供論文，光大篇幅，乃下定決心積極進行。經收集論文目錄並邀請專家學者

撰寫專論加以分類整理後，目前計劃每年至少出版研究論文集一冊，因今年適逢建國七十年大慶，特先推出「近代中國與基督教論文集」，以作建國七十年之賀禮。目前正在籌劃出版者尚有呂實強所長有關反教問題之論文專集，預計明年上半年出版，其他各集亦正在策劃進行中，敬請拭目以待。

二、內容簡介

收集在本論文集集中的論文，計分三大部份，第一部份包括李恩涵、葉嘉熾、邵玉銘三位教授之論文共四篇，其討論之重心在基督教在中國之傳佈所遭遇之衝擊與反對；第二部份包括王樹槐、王爾敏、林治平三位教授之論文七篇，其討論之中心則為基督教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與貢獻；第三部份包括趙天恩、查時傑二位教授之論文兩篇及史文森原著羅曼華博士編譯之報告一篇，其所探討之主題則為基督教在中國傳佈之回顧與展望，全書共收論文報告十四篇，約三十萬字討論時空範圍則以清末民初為主，只有第三部份涉及目前基督教在中國大陸及台灣之發展情形，故將本書定名為「近代中國與基督教」，茲將本書所收錄之論文，一一說明如下：

1. 衝擊與反對

基督教傳入中國，雖云已歷一百七十四年之久，但所遭遇之衝擊與反對，至為重大，尤其是在英法聯軍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相繼締定之後，傳教士雖因通商口岸之開放，傳教條款之保障而大舉入華，使傳教活動由被困一隅之艱苦奮鬥時期，進入擴張迅速的傳佈時期。但是，也就是由這個時期起，起自中國民間鄉紳的反教浪潮，日益澎湃，至清末民初的二、三十年間，這些衝擊與反對，成為當時知識份子主要的關切之一，要明白近代中國與基督教之關係，勢

必對於這些衝擊與反對的浪潮，有所了解，收集在這個部份中的四篇論文，其宗旨便是在此。

首先，編者要特別推介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李恩涵博士的兩篇重要論文「咸豐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同治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李先生前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參予清宮檔案教務教案檔之整理研究工作，這兩篇論文即是李先生那個時期的努力成果，「咸豐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一文原刊民國五十六年出版之清華學報新六卷第一、二期合刊本，李先生在這篇論文中，根據原始資料將清季咸豐朝（一八五一——六一）中國官紳士民反基督教言論的內容，作了一個綜合性的分析，在這篇論文的結論中，李先生指出下述兩點：

a 由於咸豐年間教會的活動仍極有限，教會所從事的文化教育醫療社會等工作，「雖然在幾處通商口岸也曾給予中國民衆以認識西洋科學的機會，但在社會傳統的偏見下，所收的效果，並不顯著。」這個時期的傳教士，在文化上的影響力微乎其微，不受重視，而「入教者又多係社會中的下層份子，或為洋商僱傭的買辦工人，或為教會所辦義塾的教職生徒，經濟環境既差，知識亦低，均不為各省知識份子的官紳所看重，甚至對之鄙視。」

b 由於此十年中各省內地弛禁傳教的根據只是基於道光皇帝的兩道上諭，而且除去香港澳門和五處口岸之外，各國教士在法理上實無權旅居各省的內地，更無權在內地租購房舍，作為教堂。因此，在此期間，各省教務雖有進展，但是都是在秘密或半秘密情況下工作的成績，「信教者也皆深知自我約束」，「不敢多所招搖，以惹動官紳的注意與仇視」。而且，在咸豐十年以前，各省官民雖然也曾發生過許多許多次迫害教士教民的案件，但純粹發自民間帶有

衆羣運動性質的反教行動，却從未發生過，這實在是咸豐年間中國反基督教運動與此後的反教運動之最大差異所在。」

收錄在本論文集中李先生的第二篇論文「同治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一文，原刊於民國五十六年出版的大陸雜誌第三十五卷三至六期。由基督教在華傳佈的歷史過程而言，一八五八（咸豐八年）、一八六〇（咸豐十年）訂立之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實爲一轉捩點，根據此兩條約傳教士可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租買田地，建造自便」；復因領事裁判權的庇護，各國傳教士的言論行動，可以不受中國法權的統轄；而且因爲條約明定滿清政府對於基督教應「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對於中國教民亦「毋得騷擾」，或「欺侮凌辱」，使得外國教士與中國教民在各省的平民間，實居於一種特權的地位，結果使基督教在華的傳教活動，與當時各國在華的政治侵略，混合爲一，難於分辨。再加上歸還康熙、雍正時期因禁教而沒收的教產的規定，使中外間因傳教而引起的教案衝突，日漸增多且更趨嚴重，其中尤以法國以天主教之保護者自居，對天主教在華之傳佈活動，動輒以外交軍事行動，加以干涉。傳佈福音而竟藉助政治軍事力量，使政治與宗教目的混然不分，引起了中國朝野人士的憤慨痛恨，在李先生的論文中，針對這些教案衝突所引起的反教言論加以整理分析，客觀而公正。在本文的結論中，李先生說：

「綜括起來看，近代中國在各方面的發展，直接間接實皆與基督教有着密切的關係。基督教對於促進中國社會之進步，固然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但因傳教而引起了各國對我作政治與經濟性質的侵略，却是近代基督教在華傳道史上的一大污點。」

「同治朝以後中國官紳反基督教的思想，自始即與歷次中外間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有着密切的關係，就長遠的目標而言，這也

實在是華基督教的一大不幸。」

這一不幸，終於導致了一九〇〇年的庚子事變，義和團的興起，把民間反基督教的情緒匯為一股龐大的洪流，決堤而出，浩浩蕩蕩的衝擊着中國基督教稚嫩的根苗——雖然，經過了將近百年的培育，基督教在中國仍然只有一棵稚嫩的根苗，這是多麼的不幸。

時代的巨輪輾過十九世紀的軌跡，轟轟烈烈的進入了廿世紀的新生。在中國，革命與維新的呼聲，透過那一代知識份子的狂熱奔走，已成為十九世紀最後十年及廿世紀最初十年的思想與行動的中心，這些在新時代中社會及思想的中心人物——他們多數曾留學歐美，接受了近代懷疑、物質及唯科學教育的薰陶——他們對基督教的態度及看法為何？尤有進者，這些具有新思潮的知識份子，他們的言行舉止，不僅影響了當時的中國社會，時至今日，他們的言論思想，仍一代一代的傳到了我們的手中，要了解近代中國與基督教的關係，我們自不可忽視他們的影響力。

因此，收集在本部份的另兩篇論文，一為葉嘉熾博士的「宗教與中國民族主義：民初知識份子反教思想的學理基礎」，一為邵玉銘博士的「廿世紀初期中國知識份子對宗教或基督教的反應」。葉先生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歷史博士，現執教於美國馬里蘭大學，其博士論文題目是：「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年間之中國反教運動（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1922~1927）」，本書所收錄的這篇論文是葉先生於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四月二十六日在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十八次學術討論會中所提出的，是葉先生博士論文的一部份，而由李雲漢先生代為翻譯，論文報告完畢後，並由呂實強教授、張玉法教授、黃昭宏教授、李國祁教授、董家安教授等六位提供質詢及補充意見，最後由主持人黃季陸博士作綜合

評論而告結束。在這篇論文中，葉博士一開始即指出：

「民國初年中國知識份子思想上的一項主要發展，便是反教情緒的成長。由於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早就有理性主義論者與存疑論者的存在，民初知識份子的仇視宗教並不能算是新奇，所新奇的乃是他們用以攻擊宗教的武器及所持的理論基礎。傳統的儒家學者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而拒絕宗教，現代知識份子之攢斥宗教，乃係由於他們認為反教是個救國問題。」

基於此一理論前提，葉先生乃對當時知識份子中的無政府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美學家、新唯實主義者、馬克斯主義者等五派對基督教之批判理由逐一分析，文末特別討論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對於宗教問題的爭論，並對一九二三年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中的宗教問題加以分析，敘述簡要明白，綱舉目張，資料旁徵博引，兼取中西，難怪呂實強教授認為「這篇論文，不僅甚為重要，也甚有貢獻。」

編者特別請各位注意，附在葉先生論文之後的幾篇討論，尤其是呂實強先生及郭正昭先生的評述，更有極精采的補充甚至反對意見，讀這篇文章如果忽略了討論部份，真是一項莫大的損失。

至於邵先生的論文則係於一九七七年夏季在美國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召開的：「中國：有關宗教的層面（China：The Religious Dimension）」的研討會中所提出者，由周如歡小姐中譯後再請邵先生親自過目。在這篇論文中邵先生選擇了具有代表性的八位當代知識份子，逐一討論他們對基督教的反應及態度，他們是：梁啟超（佛教）、梁漱溟（新儒家）、胡適（自由主義）、陳獨秀（馬克斯主義）、吳稚暉（無政府主義）、余家菊（激進派：國家主義）、趙紫辰（基督教新派）、吳雷川（激進派基

督教)等，邵先生也指出了他選擇這八位代表人物的理由：(一)他們都是那時代中具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在他們所代表的意識型態團體中，具有代表性；(二)他們所代表不同的意識型態團體，更能反映當時思想界的全貌；(三)在他們的著作中有充份而詳盡的有關宗教或基督教的資料；(四)這些文章或演講較之同時期的知識份子更有說服力等等。

編者相信，透過葉先生、邵先生精闢的論述，使我們對二十世紀初期發自知識份子的反基督教言論，必能有一全面的初步了解，這一研究領域，多年來一直乏人關切，中文著作尤其稀少，據編者所知，僅有林榮洪博士的「風潮中奮起的中國教會」（香港天道書樓）一書；對此問題之分析討論最為深入，所引用原始資料，至為宏富，讀者諸君如有進一步之探討興趣可逕行參考。有關近代中國反基督教問題之研究，中國學者中則以呂實強教授用功最勤，呂教授早在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即已出版「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一書，奠定了呂教授在此一研究領域中的先導地位，近十餘年來，呂教授在此領域中仍然不斷發表極具突破性價值的學術論文，這些論文正由呂教授重新修正整理中，不日即將交由本社出版，相信這是關心此一研究園地的各界人士所共同關心期待的一件事。

2. 角色與貢獻

如前所述，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的傳佈，固然引起了不少的衝擊與反對，但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就歷史的時代而言，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的傳佈，固然不幸的與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脚步並行而至，引起了許多不必要的誤會偏見，甚至仇恨衝突，但是一八六〇年前後，也正是中國在飽受近代化衝擊之後亟欲進行近代化的時候，感同之際的自強中興模仿西法至清末民初的革命

立憲，使傳統的中國在面臨千百年未有之變局以後有了千百年未有之演變，在這一演變過程中，我們忍不住要問：基督教的傳教士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在古老的中國努力邁向近代化的過程中，基督教究竟有什麼貢獻？這一研究領域，過去也是一片被忽視的荒原，有關論文並不多見，哈佛大學出版的「中國論文集（Papers on China）」中，曾有若干篇文章討論及此，後由劉廣京教授彙編一冊，書名「美國教士在華言行論叢」（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由哈佛大學出版，也有一些中外學者從中國教育史或中國新聞史的角度，對傳教士或基督教會所扮演的角色及貢獻加以研究，在這些研究者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王樹槐教授，無疑的是重要的一員，他的名著「外人與戊戌變法」（民國五十四年），早已成為研究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的經典之一；而同樣出身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如今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王爾敏教授，多年來一直致力於中國近代思想之研究，王先生對影響中國近代化的人與事發表了甚多論文，在中國近代思想研究上，是一位公認的權威學者，承蒙他們兩位對本書之出版，亦慨允支持，惠賜宏文，是編者要特別感謝的。

收集在本部份中王樹槐先生的論文共有三篇，均係討論寓華傳教士所從事的文化教育工作對中國近代歷史及社會的影響。第一篇「衛三畏與中華叢刊」發表於現代學苑一卷七期（民國五十三年），係討論清中葉時期暢銷廿年，發行遍全球，「一種非常成功而有影響力的雜誌」中華叢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與基督教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之間的關係。王先生在本論文中指出「中華叢刊」雖係研究中國近代史者所必知必備的參考資料，可惜歷來學者均只注重該雜誌中所含有的豐富資料，但對

該雜誌本身的演進及歷史則有極多錯誤而不正確的報導，王先生針對此弊，首先對中華叢刊的緣起詳加研究，而確定傳教士馬理遜（Robert Morrison）、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及商人柯利芬（D. W. C. Olyphant）三人共為該雜誌之創始功臣：而出身於文化事業家庭的衛三畏，於一八三三年六月十五日啓程東渡，前來中國時，已先在美國學習印刷編輯等實用技術，是以衛三畏一抵中國即能發揮長才，在編輯印刷出版工作上，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的著名人物。鴉片戰爭前後衛三畏以其特殊才幹，為美國政府聘用，參予中美外交實務工作，其影響及貢獻至於重要。王先生在此論文中，對中華叢刊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抱持正面而肯定的態度，如中華叢刊反對鴉片貿易對林則徐的影響；中華叢刊所蘊含極豐富的史料；是研究中國一八三二至一八五一年間最珍貴的歷史資料之一；也是當時唯一的漢學雜誌等項，均足以說明衛三畏一身事工即此一項即足以奠定其不朽之地位矣。

收集在本論文集中王先生的第二篇論文是「基督教教育會及其出版事業」，原刊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民國六十年六月）。在這篇論文中，王先生首先分析早期基督教教育機構的設立及其不能長久存在發揮深遠影響力的原因，繼則介紹在華新教傳教士第一屆大會（一八七七年召開）對於基督教教育的宗旨目的的討論情形，及由「益智書會」到「基督教教育會」成立的經過與工作之進行情形。在此論文中，王先生根據原始史料，製作圖表，使讀者能一目了然基督教教育會出版、銷售及財務情形，最後，王先生特別指出基督教教育會工作日趨萎縮的原因何在，根據王先生的研究，他指出：

①拓荒時期，中國人才匱乏，及至新式教育已在中國生根萌

芽，而日漸壯大，中國接受新式教育的人數日多，自然更具能力處理本國的教育問題；

②教士對中國文化，未必真能了解，如何使中西文化融會貫通，如何解決中國教育上的問題，教士無法越俎代庖；這一工作必待中國人興起自辦，始克有成。

收集在本部份中王先生的第三篇論文為「清季的廣學會」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民國六十二年出版），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想來都不會忽略廣學會在清末時期對中國近代化的影響，無論是力主革命排滿的革命黨人，或倡言維新變法的保皇黨人，甚至是清末重臣如張之洞等人，均不諱言廣學會書刊對他們思想言論的影響力，但是針對廣學會作全面而有系統的中文研究論文，則少之又少，王先生則分別就緣起與組織、經費、政策與工作、刊物等四大部分，分別論述，所列圖表清晰明確，分析討論亦深入允當，在政策與工作一節中，王先生將廣學會工作劃分為兩個時期，一為韋廉臣時期（A. Williamson）（一八八七——一八九〇），一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時期（一八九二——一九一六），在此漫長的廿五年期中，李提摩太無疑的是廣學會的靈魂人物。在此期間，廣學會藉出版書刊，舉辦活動，普遍徵文等方式積極參予鼓吹中國近代化之工作，尤其是對於變法維新思想之提倡更是不遺餘力；至於廣學會出版的刊物，在王先生的論文中，亦將之分為書籍與期刊兩類分別討論，在日俄戰爭（一九〇四年）之前，廣學會的出版重心是非宗教性書刊，日俄戰爭之後（一九〇五），廣學會之出版方針則已漸由非宗教性的書籍，轉向宗教性的書籍。至於廣學會出版的期刊則以萬國公報影響最大，其發行之兩大高潮時期，一為戊戌年前後三年（一八九七——一八九九），一為庚